

大国小家

『七一勋章』获得者吾哈斯·苏来曼——

四十年留守草原守护牧民生命

本报记者 蒋云龙

从拿起医药箱开始行医到今天,已经50多年了。我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。人生最好的时光,我都留给了牧区。辗转在各个牧场和牧民的毡房之间,寒来暑往,我都在治病、救人。

有人问过我,几十年风里来雪里去,辛苦奔波,不苦吗?不累吗?值得吗?我觉得,能够做医生,尤其是给牧民们做一辈子的医生,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

我的家乡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,我是农民的儿子,很多亲戚是山上的牧民。他们常年逐水草放牧,交通十分不便。过去草原上医疗条件不好,看病难、看病远。牧民们小病扛、大病拖,急病没奈何。亲戚们谈起缺医少药和病痛折磨,最后都只能是沉重的一声叹息。

年少的我,就想改变这种情况,让悲剧不再重演。

这是我成为一名医生的初心,也是我行医路上最大的动力。所以,毕业之后,我主动选择扎根牧区,有过调动进城的机会,我都拒绝了。



①

“我决定了自己一生的道路,要做牧民的医生”

黝黑粗糙的皮肤,是草原日晒风吹给他留下的印记,沉稳深邃的眼睛里,有温和笃定的目光。头发已经花白,额头爬满皱纹,吾哈斯·苏来曼讲起自己的故事,声音低沉而质朴。

“那年我12岁,去牧区的亲戚家玩耍。大人们聊天,说的都是谁家女人难产了,谁家男人又得病了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,一个又一个牧民生病的故事,听得他心里难受极了。

那时候的牧区,山路崎岖遥远,医疗资源匮乏。牧民们平时小病硬扛,遇到孕产妇难产、新生儿窒息、风湿骨病等难题,更是只能听天由命。“这一天,我决定了自己一生的道路,要做牧民的医生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。

之后,吾哈斯·苏来曼就开始跟村里的赤脚医生学习医术。1973年,他前往塔城地区卫校护理专业学习。毕业后,他被分配到了裕民县牧业医院。

“当时的医疗条件很简陋。我们医疗点就是3间木板房——1间药房、1间手术室、1间休息室。设备只有听诊器、体温计、老式血压计,没有急救设备,药品也不多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。

接诊的第一个患者是一名牧民,才40多岁,因常年劳作引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,疼痛难忍、行动受限。“他来的时候走路已经很困难了。双手捂着膝盖,一点一点,慢慢向前迈步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用输液调理搭配针灸按摩,悉心治疗着这名患者。

“你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好医生。”10天后,这名牧民已经能正常行走。出院的时候,他给了这位年轻的医生最高的评价。

当时,吾哈斯·苏来曼所在的医疗点位于巴尔鲁克山,距离县城260多公里,骑马要走5天。方圆60多公里、1万多名牧民都指望着一个医疗点的医生。

草原深夜,万籁俱寂。当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,那往往是最紧急的“就医信号”。“尤其

美丽的家乡养育了我,淳朴的牧民看着我长大,我要用自己的医术回报家乡、帮助乡亲。

我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,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我始终觉得,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,既然我来到牧区,就不能让牧民耽误病情。所以,在别人调休回家的时候,我更想留在牧区的医疗点,哪怕能多治一个患者,那也比回家休假重要得多。正是因此,不管是深夜突发疾病,还是雨雪天气突发意外,只要接到求助,我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。

这么多年,我接诊了很多牧民,抢救了很多



吾哈斯·苏来曼

患者,也接生了很多孩子。每当治好一个患者,看到他舒展眉头、露出笑容,听到乡亲一句朴实的感谢,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常年的朝夕相处,我和各族牧民就像一家人,他们信任我、惦记我,这份淳朴的情谊,是金钱换不来的财富。

现在,牧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医疗条件也向其他地方看齐。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,看到高学历高水平的年轻医生,看到高科技的医疗设备,我由衷地高兴,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,牧民们的健康水平有了史无前例的飞跃。



③

是冬天,马蹄声刚停下,牧民还没敲门,我就已经穿好衣服,拿起医药箱了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,被紧急呼救声唤醒是常事,他要迅速爬上马背,和来求医的牧民一起奔赴茫茫雪原。

尤其是冬季的牧区,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山路。当时没有硬化道路,路面湿滑陡峭,山路崎岖,旁边就是悬崖。稍有不慎,便会连人带马滚落山谷。“不管走多少次,还是会害怕的,眼睛都不敢往下看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。

没有患者上门的时候,他就主动出门巡诊,近处步行,远处骑马。挎着一方医药箱,走遍了牧民的毡房。在巴尔鲁克山,没有牧民不知道他。

“他对患者就像对亲人一样,时时刻刻挂在心上”

毡房内,牧民的孩子阿依古丽疼得在床上打滚。

“阑尾已化脓穿孔,必须马上手术,不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但是暴雪封山,根本无法转送到160多公里外的医院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,在征得家长同意后,他冒着风险,在毡房里为孩子做了手术。两小时后,手术成功。一周后,孩子康复。

“这也让我发现自己医术的不足,1982年,我主动前往地区医院进修,专攻外科手术和麻醉技术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,学成归来后,他率先在牧区开展阑尾切除、肠结节手术、小型肿瘤切除等此前无法实施的外科手术,大幅降低了牧民就医的成本。

回到牧区不久,吾哈斯·苏来曼便迎来人生第一次独立接生。“牧区没有女医生,我不得不把这副担子扛起来。”他回忆,1982年11月一天晚上8点,他接到出诊通知,立即赶赴牧民家中,监测孕妇血压、生命体征,细致把控每一个细节,历经两小时顺利完成接生。

男医生接生,初期也遇到过少数牧民的不理解。但吾哈斯·苏来曼用一次次成功的诊疗案例,彻底打破偏见,赢得了牧民们的信任。

1986年3月,库鲁斯台草原大雪纷飞,孕妇

夏拉帕提·屯哈孜羊水已经破了3天,孩子还没生出来。此刻,冒着狂风暴雪徒步6小时的吾哈斯·苏来曼抱着医药箱,走进了毡房,立即对产妇施行急救助产。

穿越狂风暴雪去治病救人,这是吾哈斯·苏来曼职业生涯里的常事儿。40年里,700多万亩的草原上,他先后接诊10多万人次,拯救了无数名患者。牧区的艰苦环境,使吾哈斯·苏来曼双腿患上严重的关节炎。

“这有什么不值得的,我慢慢走就好。能治病救人才是真的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步伐缓慢,但走得极稳。

“他对患者就像对亲人一样,时时刻刻挂在心上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的儿子卡那特·吾哈斯说。曾经有一名患有癫痫病的牧民来找吾哈斯·苏来曼看病,一年半的时间里,吾哈斯·苏来曼对他若干次随访,次次叮嘱,不定期为患者复查。

“按时吃药,病就能好。但牧民很难做到按时吃药,所以我得经常去盯着他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,直到这名患者终于控制住了病情,不再复发,这件事他才终于放下。

1993年,吾哈斯·苏来曼递交入党申请书。他说:“我希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我将全心全意用我的医术服务人民群众,再苦再累,我也不怕。”

“牧民需要医生,所以我来了”

时光荏苒,牧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硬化路铺上来了,医疗点的条件也越来越越好。人员方面,从最初4人扩充至30人左右,涵盖多个专科领域。设备方面,已配齐心电图、超声、检验等标准化诊疗设备,完全达到乡镇卫生院标准化水平,可独立开展检查、诊疗、康复、公共卫生等全方位服务。

能做的越来越多,吾哈斯·苏来曼也在与时俱进。1994年,他来到新疆医科大学医学院进修,系统学习防疫知识与公共卫生管理。归来后,他全力推动牧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,普及疾

我感受到了幸福,幸福不是来自功名名利禄,而是一次次把患者从病痛中解救出来,是草原百姓对我的信任和认可,是看着这片草原的牧民身体越来越健康、生活越来越安稳。

我记得自己治疗的第一个患者,他称赞我是“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好医生”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我20岁。今年我71岁了,我清晰地记得这句话,也很自豪,我这一生没有辜负这句话。

(作者为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、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,本报记者蒋云龙采访整理)

病预防知识,建立牧区防疫机制、完善公共卫生管理流程,让牧区医疗从“单一治病”向“预防为先、防治结合”转变。

“就说风干肉吧,是塔城美食,牧民最爱。但是以前放的盐很多,导致牧民容易患上高血压、脂肪肝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,一次次巡诊、一次次科普,苦口婆心之下,牧民的生活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。

2015年,吾哈斯·苏来曼退休了。大家都觉得他该歇歇了。40年里,他扎根牧区,很少回家。“牧民离不开我,回趟家也确实太远了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,每年都是在牧民春秋转场的时节,他会分别回家一次,每次1周左右。子女们思念父亲,也只能选择寒暑假期间上山探望他。

但退休的吾哈斯·苏来曼发现,还是有人需要他。于是,他又挎上医药箱,走街串巷,给县城里的老年人量血压、听心肺……

在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加依勒玛街社区,他挂牌成立了“吾哈斯健康服务室”,每周三和周六都来开展义诊,每次都有20多名患者慕名而来。2023年,“吾哈斯健康惠民行”志愿服务项目启动,最开始只有几名医务人员参与,现在志愿者已经超过350人,每周定期开展健康科普、政策宣讲、送医送药等活动。

吾哈斯·苏来曼的家,是裕民县的一座小院。走进院落,左手边的房间,被他腾出来改成一间展览室,这里有牧民送他的马鞍,有他巡诊的器具,还有曾经在牧区出诊的图片。这是新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变化的实录,也是一名牧区医生用一生书写的故事。

“牧民需要医生,所以我来了,我做的就是这样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我做得真的不多,但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多。”吾哈斯·苏来曼说。

图①:吾哈斯·苏来曼在义诊所。

图②:吾哈斯·苏来曼在牧区工作的历史照片(翻拍)。

图③:吾哈斯·苏来曼在牧区工作时使用的手术器械。

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蒋云龙摄

本版责编:申少铁 蒋雪鸿 版式设计:汪哲平

枝叶关情

把爱传递给更多罕见病病友

主讲人:天津市武清区太阳语罕见病心理关怀中心主任 魏瑞红

我是魏瑞红,是天津市武清区太阳语罕见病心理关怀中心的发起人,也是一名与成骨不全症相伴了40多年的“瓷娃娃”。

4岁那年,我坐在小童车里想掰一块烧饼,烧饼纹丝未动,左臂却传来“咔嚓”一声脆响——那是骨头断裂的声音。这样的场景,从我出生起就在重复,打喷嚏会骨折,翻身会骨折,甚至穿衣、做噩梦都可能会让骨头受伤。医生曾说我活不过12岁,建议父母放弃治疗。但我的母亲用竹板和绑带为我固定骨折的四肢,用布满老茧的手为我擦拭泪水,用她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我的生命。

初中毕业时,我以全县前十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,却因身体因素无法入学。那一刻,我蜷缩在家里,望着窗外,第一次问自己:“难道我的人生,只能这样了吗?”

辍学后的我,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文字,无数次投给报社。第一篇稿件刊登后,我收到了来自各地的信件。有人写:“瑞红,你的文字让我重新

站了起来。”

1999年,我用家里的电话办起了“瑞红知心热线”。深夜的电话铃声常常惊醒父母,但他们总是默默为我披上外套。为了更专业地帮助他人,我自学完成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课程,用一年半时间通过了16门课程考试,又陆续考取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、二级资格证。那些啃着书本度过的夜晚,那些与病痛抗争的黎明,最终让我从一个求助者变成了给予他人力量的人。

2009年,在北京参加病友大会时,看到会场里那些年龄很小、眼神无助的“瓷娃娃”时,我心中暗下决心:“我一定要让他们未来的路走得更美好!”带着这份决心,我辞去河北老家的的工作,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。

2012年,命运再次挥下重锤——我被确诊为颅底凹陷症,生命危在旦夕。国内无法手术,国外治疗费用高达40万元。绝望中,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联合热心网友在网上帮我发起了筹款

活动,我承诺用4000小时心理咨询服务预支手术费,没想到,短短25天,1600多位爱心人士接力相助,筹集到40余万元。手术成功后,我想要兑现心理咨询的承诺,但电话那头的他们说:“瑞红,你活下来,就是最好的回报。”这句话,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:把这4000份爱传递给更多罕见病病友!

2013年底,我和爱人来到天津市武清区,创办了太阳语罕见病心理关怀中心,服务像我一样的“瓷娃娃”。“太阳语”,寓意用阳光般的话语温暖每一个被疾病冰冻的生命。从没有办公室、睡光板床的艰难起步,一步步发展到如今构建起全方位的帮扶体系。

我还记得9岁的女孩小敏,手术中她的腿骨被截成三段矫正,剧痛让她发抖,却坚强地不哭出声。她悄悄告诉我:“等腿直了,我想穿上粉裙子走到同学中间去。”当新裙子送到她床边时,她眼里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病房。这些瞬间让我们明白,我们守护的不仅是孩子们的身体,

更是孩子们最珍贵的梦想与尊严。

10多年来,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,我们为3000多个罕见病家庭带来希望:创建“彩乐病房”,用图书玩具装扮病区,让冰冷的医疗环境变成温暖的陪伴,筹集260余万元帮助220多名病友手术,提供6000多次心理关怀。面对病友失学问题,我们创立太阳语梦想学院,从病房小课堂发展到线上课程,已覆盖500余名病友。

为促进“瓷娃娃”伙伴的社会融入,我们筹集50余万元为600多名病友捐赠适配轮椅、助行器,让他们第一次“走”出了家门。对病友开展自媒体培训,帮助200多名“瓷娃娃”、血友病



魏瑞红(右一)在公益活动中与罕见病患者及家属交流。

受访者供图,AI修饰生成素描画

等病友获得了收入。罕见病患者不是社会的负担,我们同样可以用双手创造价值。

这些年,我们联合各部门发起“4万份爱生命教育工程”,走进学校、社区,用罕见病患者的生命故事引导青少年热爱生活、珍惜生命。我希望用我们的故事告诉孩子们:生命的美丽不在于肢体的完美,而在于灵魂的阳光。生命给予我的不是完整的骨骼,而是永不破碎的信念。

(本报记者靳博采访整理)